

# 反讽与追忆:《西都赋》中的成帝书写

刘 祥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东汉初年,汉成帝被排除在圣统叙述之外,成为帝王奢侈的典型。班固在《西都赋》中,一面极力描摹昭阳之盛,将成帝与武帝并列,作为西都奢侈的代表,以史家的眼光分析西汉衰落的原因;一面深情回忆十世之基,追慕西都最后的盛世,代表了东汉初年部分士人的普遍心态。除了成帝奢侈同于武帝与马、扬大赋的典范作用之外,班氏家族对成帝时“羽仪上京”的集体记忆,是造成《西都赋》重视成帝之世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汉成帝;《西都赋》;昭阳殿;十世;家族

[中图分类号] I207.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8)01-0075-05

## Irony and Remembrance: Writing of Emperor Cheng in *Ode to Xidu*

LIU X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Emperor Cheng was excluded from the narrative in Holy system, which is a typical imperial luxury. In the *Ode to Xidu*, Ban Gu described Zhaoyang's prosperity, regarded both Emperor Cheng and Emperor Wu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luxury in Xidu, and analyzed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from a historian's perspective. Meanwhile, he also fondly recalled the foundation of ten generations, admired the last flourishing age of Xidu, which represented the general mentality of some scholars in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Apart from the luxury of Emperor Cheng and Emperor Wu, and the model role of Ma's and Yang's odes, the Ban family's collective memory of Emperor Cheng's time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of the focusing on Emperor Cheng in the *Ode to Xidu*.

**Key words:** Emperor Cheng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Ode to Xidu*; Zhaoyang Palace; ten generations; family

成帝朝确立了汉王朝的宗法圣统,以高祖、文帝、武帝为不祧之祖<sup>[1]</sup>,后世在不断增续过程中,基本延续了这一顺序,然而在东汉初年的圣统叙述中,成帝的地位却颇为尴尬。“光武都洛阳,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为一庙,藏十一帝主于其中。元帝次当第八,光武第九,故立元帝为祖庙。”<sup>[2]27</sup>光武取代成帝,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而将成帝以下诸帝祭祀放在长安。<sup>[2]70</sup>早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他在回答王郎使臣时就说：“设使成帝

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sup>[2]493</sup>在登基之前,光武已有代成帝而继续的想法。杜笃《论都赋》在赞美高祖至宣、元诸帝之后说:“侈极于成、哀,祚缺于孝平。”<sup>[2]2600</sup>他将成帝作为西汉衰落的开始,以奢侈作为成帝朝政治的标志,定下了东汉初年辞赋中成帝叙述的基调。《西都赋》延续了对成帝奢侈的批评,然而在批评的同时,颂扬的成分十分明显,班固对成帝的态度颇可玩味,笔者拟从“昭阳特盛”“十世之基”“羽仪上京”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收稿日期:2017-05-24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第60批后面上基金资助项目“汉代辞赋与外戚政治”(2016M602792)

作者简介:刘祥(1988-),男,山东临沂人,西安交通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

## 一 昭阳特盛

《西都赋》在述及宫室至后妃之室时曰：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缸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扣砌，玉阶彤庭，硬碱彩致，琳琅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sup>[2] 1314</sup>

李贤注：“昭阳殿，成帝赵婕妤所居也。”<sup>[2] 1343</sup>赵飞燕与赵合德皆曾为婕妤，李贤注未明为谁，今按《汉书》：“皇后既立，后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缸，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sup>[3] 3989</sup>则居昭阳殿者为赵合德。所谓隆乎孝成，与“自后宫未尝有焉”的描述相一致，都将成帝时的昭阳殿以及成帝对女色的耽溺作为西汉诸帝之首。所描述的场景，材潜墙隐，与殿上施漆相对；金缸衔璧，与壁带为黄金缸相对；玉阶彤庭，与中庭彤朱、白玉为阶相对。赋文与史书相互映照，可以互为注解，充分表明《西都赋》的这段描写纯为实写。反观《西京杂记》所载：“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缸，含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白象牙簟，绿熊席。席毛长二尺余，人眠而拥毛自蔽，望之不能见，坐则没膝，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镇，皆达照，无瑕缺。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龙蛇，萦绕其间，鳞甲分明，见者莫不兢栗。匠人丁缓、李菊，巧为天下第一。缔构既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说之，而外人稀知，莫能传者。”<sup>[4] 13-14</sup>前两句与《西京赋》一致，后面对奢侈场景的详细描述，则有小说家言的意味。此书又有“飞燕昭仪赠遗之奢”“宠擅后宫”“赵后淫乱”诸条极度言飞燕姐妹荒淫无度、专宠奢靡。飞燕姐妹最大的罪状，不在于专宠奢靡，而是绝杀皇嗣，其中详委在《汉书·外戚传》所录司隶解光的奏议中言之甚详。议郎耿育上疏则将飞燕之祸，当做有损成帝盛德的污点，以诛杀“宠妾妒媚”<sup>[3] 3997</sup>为己任。可见时人将宠幸飞燕姐妹当做评价成帝朝政治的重要事件，而昭阳殿则是其标志。

富丽堂皇的昭阳殿特出于汉代后宫建筑群之中，代表了班固对汉代后期最为重要的两个问题的审视：好女色与任外戚。这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帝王好女色是外戚获得权力的基础，而外戚往往又是女主权力的外延。成帝好女色之盛无与伦比，赵飞燕姐妹烜赫一时、左右朝政，而外戚势力也是在此时逐渐占据朝堂，为哀、平以后王莽篡权埋下了祸根。《汉书·成帝纪赞》批评道：“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sup>[3] 330</sup>所以班固在《西都赋》中特地以征实之笔刻画昭阳殿，不仅直接批评了赵氏，而且为《东都赋》批评王莽埋下了伏笔：“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sup>[5] 29</sup>王莽之乱至关重要，横亘在东、西汉之间，它既是班固对西汉末年之乱的总结，尤其对成帝始乱之局的批判；又是他颂扬光武中兴的契机：正因此乱世，光武方造就东汉基业。综此而论，班固以史家眼光，探究西汉灭亡的原因，通过对昭阳一座宫殿的描述，探寻国运转捩的痕迹，非赋家泛写宫殿者可比。

在赋作中批评成帝好女色并非班固首创，早在扬雄《甘泉赋》中，即已显露端倪。“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惩戒齐肃之事。”<sup>[3] 3535</sup>成帝朝公卿之间爆发了郊、庙之争，甘泉泰畤屡屡废兴，此次成帝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的动机，即是求祭嗣。从成帝为讨赵昭仪欢心，纵容她杀皇嗣看，此次祭祀是为赵氏姊妹求子，而非仅仅在于求皇嗣。赵昭仪出现在甘泉卤簿之中，参与这次重要的祭天大典，既是成帝此次祭祀功利化的表现，也是扬雄创作此赋的重要讽谏目的。扬雄不仅不满于赵氏出现在属车豹尾间，更为厌憎赵氏专宠、杀嗣却又诬神求福。他意欲告诉成帝求得祭嗣不需要庞大车队、劳师远行，只要摒却宓妃、玉女，自然皇嗣不乏。扬雄的这种盛陈以讽的模式，为《西都赋》奠定了基础。昭阳殿与甘泉宫在讽刺女色上联系到一起，成为赋家讽谏帝王的工具。越是精工富丽的描绘，越见讽俗救世之心的强烈。《西都赋》的奢侈描写，正是为《东都赋》对永平之治的颂扬作铺垫。

班固将赵氏所居之昭阳殿作为西汉后宫宫殿之最，带有两层含义：一是反映了成帝极崇女色；二是彰显了成帝时拥有建造这一宫殿的强盛国力。他以西都宾的视角着笔，突出国力之盛，所以才会在后文称赞十世基业；又从东都主人的立场出发，批评成帝好女色，作为东汉优于西汉的证据。在对

东都的显性赞扬与对西都的隐性批评之间,班固的心态极为复杂,东都主人并非他唯一的意志代表。

## 二 十世之基

《西都赋》在文末极言西京之盛曰:

遂风举云摇,浮游普览。前乘秦岭,后越九峻,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行所朝夕,储不改供。礼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游童之欢谣,第从臣之嘉颂。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sup>[2]1348</sup>

此段赋文以“于斯之时”为分界,分为前后两段。斯时是何时呢?下文对“十世之基”的描述透出一点端倪。关于“十世”,吕延济注:“言藉十世余址也,大夫称家,亦承百年职业。士但食先生旧德,族荫而已。”<sup>[6]27</sup>只是对赋文的隐括,并未确指。李贤注:“十代、百年,并举全数也。”<sup>[2]1352</sup>他以为“十世”只是笼统泛指。李氏所言非实,此“十世”乃特指成帝。理由有四:

1. 两汉之际的“十世”。扬雄《甘泉赋》:“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定泰畴,雍神休,尊名号,同符三皇,录功五帝,恤胤锡羨,拓迹开统。”按,“十世”,李善注:“成帝也。”<sup>[5]322</sup>李周翰曰:“成帝当汉之十世。”<sup>[6]160</sup>高步瀛细数十世为:“高帝、孝惠、高后、孝文、孝景、孝武、孝昭、孝宣、孝元、孝成,凡十世。”<sup>[7]</sup>汉人计算西汉统系,大多将高后作为一世,故至成帝为第十世。班固《汉书》作十二本纪,第三即为《高后纪》,第十为《孝成纪》。班固《幽通赋》亦言“皇十纪而鸿渐”,皆将第十代明指汉成帝。

2. 耆老的身份。《两都赋序》叙述创作原委:“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sup>[5]3-4</sup>耆老是汉人对年老德尊之人的普遍称呼,早在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中即已出现。班固此赋作于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sup>[8]</sup>,此时上距成帝末年绥和二年(公元7年),不过60余年,耆老如非见过成帝之政,也当耳濡目染于父辈。两汉之际士人怀念成帝者颇多,如桓谭《仙赋序》“余少时为中郎,从孝成帝出祀甘泉河东”云云,明其少时为官成帝朝,后来他历哀、平、莽,卒于光武时,“《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sup>[2]961</sup>生活年代与班固相接,又

有续补《琴道》之事,可证班固与成帝时遗老行迹相接。所谓“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sup>[3]1335</sup>所言耆老并非虚言,当为成、哀、平时遗存故老,西都宾这一形象的设置也就有其现实意义。观桓谭《仙赋序》追述孝成帝郊祀甘泉、河东,至华阴集灵宫,殿名“存仙”,门曰“望仙”,可知他对成帝盛时何其怀念。西都宾的叙述虽于赋作而言,有所夸饰,为东都主人的驳斥作铺垫,而于班固,却绝非仅仅如此。他闻见西都遗老对盛世的怀念,所创作出的东都宾形象,拥有强烈的现实基础,所抒发的怀念之情,实乃东汉初年文人尤其是西都遗老们的普遍心态。追慕西汉,是东汉文人无法解开的心结。

3. 西汉末年的政治形势。西汉末年政治日渐衰颓,对于两汉之际的士人来说,王莽之乱是他们的梦魇,每每在赋中提及。班彪《北征赋》哀叹:“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阨灾。”<sup>[5]426</sup>隗嚣移檄告郡国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震怒上帝。”<sup>[2]515</sup>西都耆老的赞扬绝不可能指王莽之时。再看孝平皇帝,政治完全控制在王莽手中,灾异屡现,民间怨怒。孝哀皇帝颇欲有所作为,但即位之初便病足,六年病死。在位期间,其屡诛大臣,宠幸董贤,任用丁、傅外族,虽欲振衰起敝,而又才力不逮,纵恣无度,更兼享国不永,亦是乏善可陈。综上,哀帝、平帝、王莽之时皆不当为“十世之基”的叙述范围。而观孝成政治虽有好女色、任外戚之弊,然而成帝“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sup>[3]330</sup>。“承平”二字道出成帝时的社会面貌,此时太平已久,天下安宁,公卿称职,儒生政治形成并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建设,仍然是盛世光景,所以才能都邑相连属,家族资产累积雄厚,士、农、工、商各传其业、各得其所,家族势力的强盛是此时强盛的重要标志。

4. 《两都赋序》的呼应。《两都赋序》:“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婚儿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sup>[5]2-3</sup>论者引用《两都赋序》的这段文字,往往注重武宣之世的献赋盛况与成帝时奏御之作的众多,而忽略了“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一句。“而后”一辞紧承孝成之世而来,不啻于是说至孝成之时,总

有武宣以来辞赋盛况,方形成了可与三代相媲美的大汉文章。班固将汉赋成为一代文献的代表,以孝成之时作为西汉集大成的时代,而与《西都赋》中所言十世基业相呼应。成帝时不仅将赋录而论之,并且系统地整理了中秘书。《西都赋》:“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原原本本,殚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sup>[5]15</sup>承明庐、金马门非专指一朝,而“启发篇章,校理秘文”却极有针对性。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sup>[3]310</sup>。《汉书·艺文志》描述此事说:“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sup>[3]1701</sup>西汉末年的典籍整理意义重大,基本奠定了传世古书的面貌,诚乃成帝朝的文化盛事。

综上所述,《西都赋》中“十世之基”既是对成帝朝社会状况的现实描绘,也是对西汉王朝最后盛世的深情回眸。西都耆老的回忆并非泛泛而谈,班固的选择有现实考量。《东都赋》驳斥西都宾曰:“吾子曾不是睹,顾曜后嗣之末造,不亦暗乎?”李贤注:“言吾子曾不睹度势权宜之由,而反炫耀后嗣子孙末代之所造,非其盛称武帝、成帝神仙、昭阳之事也。”<sup>[2]1306</sup>西都耆老将武帝、成帝作为西都两大盛世。武帝文韬武略,征伐四方,被班固赞为“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sup>[3]31</sup>,被作为两大盛世之一,理所当然。然而,为什么成帝也会被着重叙述呢。

### 三 羽仪上京

《西都赋》中成帝与武帝等列的原因很多,最为重要者有三:一是奢侈同于武帝;二是赋学典范的影响;三是家族记忆的牢固。

1. 奢侈同于武帝。吕思勉《秦汉史》:“汉治陵夷,始于元帝,而其大坏则自成帝。帝之荒淫奢侈,与武帝同,其优柔寡断,则又过于元帝。朝政自此乱,外戚之势自此成,汉事遂不可为矣。”<sup>[9]</sup>成帝奢侈上文已有所及,昭阳殿就是其奢侈的集中显现;而甘泉宫与甘泉卤簿,与武帝朝的关系更为紧密。《扬雄传》在叙述《甘泉赋》的创作缘由时说:“甘泉本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与帝室紫宫,若曰非人

力之所谓,党鬼神可也。”<sup>[3]3534-3535</sup>我们在关于成帝的政治叙述中常常可见武帝的影子,由武帝所开创的甘泉泰畤、河东祀地就是典型代表。成帝时,甘泉、河东虽曾被南北郊祭短暂取代,但是成帝的甘泉祭祀却成为西汉最后的帝王盛大出行。哀帝建平三年,虽然恢复了甘泉、河东祭祀,然而由于哀帝病弱,并未亲临,所以,后世张衡在《东京赋》中赞扬永平盛世,描写郊祀而用大驾,就是对武帝以来尤其是对成帝甘泉卤簿的追慕。<sup>[10]</sup>

2. 赋学典范的影响。西都宾之所以以武帝、成帝为追慕西京的重点,也与赋学马、扬两大典范的确立相关。至少到了扬雄,对司马相如的推崇已经到了一定高度。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说:“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sup>[3]3515</sup>班固指出扬雄对司马相如的效法。在《赞》中又引扬雄自序“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之语,表明扬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即是模仿《子虚》《上林》等赋而作。风格的模仿,在东汉初年带动了内容的书写,司马相如赋颂扬的是武帝盛世,扬雄赋摹写的是成帝政治。而对于班固来说,他继承马、扬创作风格,不但在艺术手法上受其沾溉,在描写内容上也受到影响,在赋中自然而然地将武帝、成帝合写,将二者作为铺扬西汉盛况的代表。《东都赋》中西都宾赞叹东都主人所作五诗:“美哉乎此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sup>[5]40</sup>班固在创作之时,有意地将马、扬作为模仿的标杆与超越的对象,顺带着扬、马所描述的武帝、成帝也就成了《西都赋》重点介绍的帝王,神仙、昭阳也就被格外凸显出来。

3. 家族记忆的牢固。班固之所以对成帝再三致意,与当时逐渐兴起的家族意识密切相关。元、成以来经学家族日益兴盛,经学出现了由师法向家法的转变。班固的家学兴起于成帝朝的祖父辈,大伯祖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又遵成帝令受《尚书》《论语》于郑宽中、张禹;二伯祖班斿曾任刘向校对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sup>[3]203</sup>汉代书籍难求,唯有皇家藏书最为丰富,东平思王求《太史公书》、诸子书,尚且不能得。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班固等人,都有阅读皇家藏书的经历。桓谭欲借阅班家藏书,被班嗣拒绝,以致有读书少之讥。班家得赐中秘书的意义非同凡响,奠定了班氏家学的根基,所以到了班固的父亲班彪,“幼与从兄嗣共游

学,家有赐书,内富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sup>[3]4205</sup>至班固,才能博贯群籍,广泛涉猎九流百家之言,学无常师,不守章句,成为一代通儒,创作出《汉书》与《两都赋》。究其家族学术根基、仕宦之路,莫不奠定于成帝朝,而外戚身份则是班家在成帝朝辉煌的关键因素。班婕妤是班固祖父的姐妹,成帝之初成为婕妤,班家遂得到成帝的厚爱,父子昆弟仕于朝。虽然后来班婕妤失宠,然而由于她谨慎侍奉王太后,班家与外戚王家交好,仍然能在成帝朝显赫一时。<sup>[11]</sup>

班氏以外戚起家,所以班伯在借纣王讽成帝之时,关注点不在于色,而在于酒。至班固,班家的外戚色彩早已淡化,才会大力批评昭阳殿的奢侈。然而如果考虑到班家失势与赵家得宠的关系,那么班固对成帝宠爱赵昭仪的批评似乎可作别解,这其中蕴含着一定的家族情绪在内。不过,班氏对成帝朝的主流记忆仍然是家族的优宠与王朝的兴盛,班固《幽通赋》:“系高、项之玄胄兮,氏中叶之炳灵。飏凯风而蝉蜕兮,雄朔野以颺声。皇十纪而鸿渐兮,有羽仪于上京。”颜师古引张晏:“《周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以为仪。’成帝时,班况女为婕妤,父子并在京师为朝臣也。”<sup>[3]4213-4214</sup>《周易》原文出自《渐卦》上九爻辞,王弼注曰:“进处高洁,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乱其志,峨峨清远,仪可贵也。”孔颖达《正义》曰:“鸿渐于陆者,上九与三皆处卦上,故并称陆上。九最居上,极是进处高洁。处高而能不以位自累,则其羽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也。”<sup>[3]11</sup>上九所居位高,以比班氏位高;进处高洁、不累于位,羽毛可为物表,以比班氏虽贵为外戚,却不同于李、赵,守礼重法,好学自持。班固用此典故,充分反映了他对这一段时光的重视与怀念。他的这种观点渊源有自,《汉书·成帝纪赞》曰:“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仪容,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sup>[3]330</sup>究其语气“臣之姑”云云,则作此赞者当为班彪。班彪对家族历史极为珍视,父子昆弟得侍帷幄的自豪溢于言表,班固对成帝了解之深入、感情之深厚也就顺理成章。

《西都赋》虽然是为《东都赋》的颂扬作准备,属于欲抑先扬、欲讽反颂,然而就其自身而言,却有一定独立性,反映了东汉初年的一种社会心态,也是班固内心世界的某种折射。对武帝好神仙、成帝

好女色等具体批评针对性很强,而对成帝“十世之基”的赞扬,便有强烈的颂扬意图。如从《两都赋》全篇来看,《西都赋》无疑是“讽”的部分,而“十世之基”之类的叙述则成了“讽中之颂”,《西都赋》的创作也就有了颂—讽—颂的多层次书写。纵观汉大赋中的成帝叙写,多在于讽颂之间,属车豹尾、昭阳特盛,反映出成帝的奢侈与好色;十世之基的描绘呼应了成帝朝宗法圣统的确立,为成帝找到了相应的历史定位。

除了明显的书写,成帝有时会隐性地出现在赋作中。如《二京赋》中的大驾描写,违背了当时郊祀不用大驾的礼制,可视为对西京甘泉卤簿的追慕;张衡对郊祭的格外重视,是对首议郊祭的成帝之治的深层回忆,颂扬了初步确立的儒生政治。汉赋中成帝书写的心理动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当朝政治的干预,如扬雄赋讽谏时主的现实精神;另一种则是对古代政治的怀念,蕴含着复杂的情感。《两都赋》中存在着反讽、追忆等多个叙述视角,反映了班固深层的心理内涵,体现了班固对成帝政治的深沉追忆,是东汉士人对西汉集体回望的代表。东汉人无论是对《七略》的继承,还是对南北郊祀的赞美,抑或对宗法圣统的追述,都有对汉成帝的潜在颂扬。

#### 参考文献:

- [1] 蒋晓光,许 结. 元成庙议与《长杨赋》的结构及影响[J]. 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6):171.
- [2] 范 晔. 后汉书[M]. 李 贤,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 班 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 刘 歆. 西京杂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5] 萧 统. 文选[M]. 李 善,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6] 萧 统. 文选[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7] 高步瀛. 古文辞类纂笺[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1757.
- [8] 刘跃进. 秦汉文学编年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58.
- [9] 吕思勉. 秦汉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60.
- [10] 刘 祥. 从汉大赋中的天子车驾看汉代礼制[J]. 北京社会科学,2015(6):83.
- [11] 刘伟生. 唐赋研究三十年述评(1978—2008)[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5(1):139.

责任编辑:黄声波